

孙子兵法原文的考证

不应再有所怀疑了

站在中华民族文化上，中国国防建设上，不容我们对于这一部经典——「民族之魂，国防之宝」的孙子兵法有丝毫的怀疑了。

因为我们既用它来御侮图存，却又怀疑它，这是何等矛盾！其影响所及，徒足损害吾民族的自尊心与国防的自信心而已。

任何一代的兵家，无人敢说孙子是一部伪书，我读过日人研究孙子的著作达数十种，亦无人稍抱怀疑的态度，都是异口同声的推崇备至。独自宋代以来，有些文士却持怀疑的见解，谓孙子非孙武所作，或为孙臆所著，如宋儒叶适因不见左传有孙子的记载，便武断孙子之书为春秋末、战国初的山林处士所为。可是以孙子这样一部古今无匹的伟着，难道山林处士可以写得出吗？至于说孙子不知果为何代人的宋儒陈振孙，徒见其浅薄而已。到了近代，有些学者说是伍子胥所著，更为滑稽。如果这一部杰作是伍子胥手着，伍子胥既做了大官，又能写出伟着，何不直书己名，既可以炫耀于时，又可以扬名千古呢？我想这是绝对不会有有的。又有「中国历史精神」的作者钱先生亦赞同梁启超先生的意见，说是齐国孙臆所著，这也是不正确的。考孙子十三篇始于历史家司马迁，如史记孙子传载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尽观之矣。」当然以这一个记载为最可靠的。司马迁为汉代太史公，继承父业（其父司马谈为汉太史令，职掌天文国史），曾漫游大江南北，博访周咨，搜集了不少资料，又偃集金匱石室之藏书，不知根据了多少竹书、木书、帛书等资料来作史记，每一记载，当是根据原始资料，不会捕风捉影，随便下笔的。看他在史记上引用了不少孙子的话，足见他亦为熟读孙子的一人。至于秦始皇焚书，系烧掉六经（因儒生根据六经来非议秦皇），并非烧掉杂家的书，孙子为杂家之一，常时秦皇正需要运用它的原理来建设国防，如万里长城等，及抵抗向北部入侵的匈奴，更不会把它烧掉，故它必定完整无缺。又司马迁生距周敬王时四百年不到，传闻上亦不致误张冠为李戴。而后人凭一时的一知半解或一些文句的推测（有些文句或为后人增入未定），乃武断孙子为孙臆所著或他人所著，妄图推翻司马迁最早而最可靠的记载，以减低孙子的价值，打击中国民族兵学，阴售其「重文轻武」之奸计，又博得「创见」之名，这样，试问于学术上有何贡献？对于民族国家又有何裨益？

孙子的篇数问题

同时，我也是赞同清代「四库全书」的总纂纪昀、陆锡熊、孙士毅等在孙子提要上的论证，谓孙子「确为武所自着，非后人嫁名于武也。」故唐张守节于着史记正义乃引梁阮孝绪的七录之说：「孙子兵法三卷，十三篇为上卷，又有中下卷。」以解决此悬案。但依我的研究：除十三篇原文外，其余六十九篇及图九卷或为孙子后来所作的遗文，或为其后世孙臆所作的专论，或为后人所作的注解附于其末亦未

定（请参阅拙著「孙子兵法新研究」一书的总论）。近见有擅把十三篇割裂分为八十二篇，以符汉艺文志的记载，徒见其牵强造作而已。

被外国人誉为世界军事天才之一的曹操，他为注释孙子的第一人。他是一个名将，也是一个名作家，根据他的考证，他是赞同司马迁的记载的。他序孙子说：「吾观兵书战策多矣，孙武所著深矣。孙子者，齐人也，名武，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篇。」以曹操的天才与学问，左右又有无数兵家为助，他既读其书，又注解其书，既称十三篇，当有所本，绝非盲目附和司马迁之言。不过他却说：「而后世人未知深亮训说，况行文烦富，行于世者，失其旨要，故撰为略解焉」。可见孙子自流传于世后，后人写了许多注解（即训说及行文烦富，也许是指多出的六十九篇）附于其中，多失其旨要，故他特加删削，另为注解，成为流传至今的曹着孙子。但陈振孙因见杜牧说：「魏武帝削其繁剩（或即原有注解，或所多的六十九篇），笔其精粹，凡十三篇，因注解之。」的话，便怀疑十三篇为曹操删削而成，实因他未读通杜牧的文章，而杜牧亦未研究清楚曹操的序文，故行文稍有语病而已。

真的，孙武所著兵法是十三篇的。既有司马迁载称于前，又有曹操断证于后，是无可怀疑的了。

孙子的字句问题

不过十三篇经过二千多年的流传，相信字句上难免不无一些不能存真之处，这是我敢断言的。从历代字体的变迁来看，孙子当时所作的十三篇，其字体是用大篆写的（亦称古籀，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），后大篆改用小篆（秦李斯作），所有古书又要由大篆改为小篆。汉代又改用隶书（秦程邈作），后又由隶书改为楷书（始于后汉王次仲，备于魏钟繇），字体上像这样的改变，而十三篇在每一次的改变又要重写一遍，在这重写之中，难免不无错误之处。又春秋时所用的写字工具是用竹条或笔蘸漆或墨写于竹简或木板（不是用刀刻，是写错时用刀削去）或布帛上，汉以后用纸（自蔡伦造纸始），因所用的工具不同，辗转誊写，亦难免不无错误处。又当写在竹简上时，即一片竹写好之后，便用皮条或青丝编串起来，成为一篇或一部，日子久了，皮条或青丝断了，或遭天灾人祸以致散乱，后人把竹简穿错了，弄得上下文不相连贯，便成为所谓「错简」。又因竹简散乱了，有的遗失，后人无法找全，权把它编串即来，便又成为所谓「脱简」，此外也有「断简」的，即断了的竹简，无从找到的也有。我们今日细读十三篇，间有此感。明代孙子注释家刘寅、张賁等就怀疑「军争第七」与「九地第十一」有错简之处。又孙子的原文，以流传日久，难免不无好事者流，或自以为是之辈，间加增删的情事，因之在各版本的字数上间有多少增减之处，现我所根据的系民国三十七年在苏州虎邱所修建的「孙子十三篇全文碑」，该碑全文共六千一百零八字，这是我们当时根据最古的宋版孙子，并参照明版孙子，清版孙子（清代考据家孙子五十七世孙孙星衍校订本）校订而成，堪称定本。当时我发现孙星衍的校订本较之宋版本在字句上稍有增减之处，例如宋版本为「始计第一」，孙校订本则为「计篇第一」，宋版本为「军形第四」、「兵

势第五」，孙校订本则为「形篇第四」，「势篇第五」等等，又如宋版本为「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，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」（始计第一），孙校订本：「道者，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民不畏危也。」彼此对照，孙版本则多了三个字。宋版本：「胜者之战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形也。」（军形第四），孙校订本：「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，形也。」是孙校订本又多了两个字。宋版本：「若驱群羊，驱而往，驱而来，莫知所之」（九地第十一），孙校订本则多了一句，且在造句上，亦有出入之处，为：「焚舟破釜，若驱群羊而往，驱而来，莫知所之。」等。不过倒不重要，为数亦有限。中国古书皆有此种情形。虽说十三篇以流传日久，不无多少与原文相出入之处，起码总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存真。

孙子作于何地问题

孙子生于周敬王之时，而十三篇究作于周敬王何年？费时若干？无史可考，不能臆断。不过他不是作于北方的齐国，而是作于南奔之后的吴国，可断言的。考孙子为齐国孙书之孙（孙书伐莒有功，封于乐安，请参阅拙著「孙子兵法新研究」的总论。生长于武将之家，家学渊源，尤喜精研历代战史与兵法，在奔吴前，一定干过武职，打过仗，且具有卓越的天才与实战的经验。但因不得志于时，又因田鲍四族谋作乱，故愤而奔吴，奔吴之后，得知于伍子胥，子胥欲荐之吴王阖闾，乃先作兵法十三篇以献。可见十三篇是作于南方的吴国，今日我们从十三篇的文章上看来，亦可判断是作于南奔之后的吴国，即今之苏州。（附注：清孙星衍曾在苏州虎丘山麓建祠以祀孙子。中国现代兵学界亦曾在该地建碑纪念孙子，见「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追记」。）

最近偶一读孙子兵势第五：「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」这句话，不禁有所感。长江以南，地势多山，与长江以北、黄河流域一望千里的平原迥异，南方有些河流在大雨中，其水势真如天上而来，「漂石」是很普遍的现象。又孙子当时在由北到南的奔吴旅途中，通过千山万水，这位哲人未免到处考察地理，及观察自然现象，故他在十三篇中甚多论及山地的形势。而十三篇之作，也许在这孤寂冷静的旅途中，已打下腹稿。至于北方平原，地势平坦，河流缓慢，开封以东的黄河，就是最好的例子，「漂石」是不可能的，其实亦无石可漂。孙子当时为得到吴王阖闾的用已，故多用南方的地理名词去激发吴王，如虚实第六说：「越人之兵虽多，亦奚益于胜哉？」九地第十一说：「故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，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」又说：「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，当其同舟济而遇风，其相救也，如左右手。」同样合乎情理，取喻切近动听。故梁启超先生等谓为「齐孙子」（孙臆）所作，即作于北方的齐国则不对。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个大学术家，但在这一点上殊欠高明。正如曾国藩为清代一个大军事家，但他却不信韩信破魏豹以木罌渡军，破龙沮以囊沙壅水的事（见「曾氏日记」），使我不得不在拙著「兵学随笔」上予以辩正，这也许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吧！

居今之日，我们应如何致力发扬孙子以供实践，再来动笔考证孙子，似无多大意义。惟因有感于世人往往被那似是而非的见解所迷惑，故特作斯篇，并以就正于高明！